

编者按:

今天是孙犁先生逝世22周年忌日,本刊特以专版形式刊发《〈铁木前传〉新考》《不负平生识真金》《荷花淀》三篇作品,以示缅怀。南北洋研读大量孙犁作品,从中受到教益和启发,实地走访《津门小集》中提到的白塘口村,有了不同于他人的新发现:中篇小说《铁木前传》的写作时间、孙犁创作前的思想状态及“铁木二社”的原址等,并提供了翔实而可信的论证,使这部经典作品又有了新的解读。闫庆生先生曾有《晚年孙犁研究》《美学与心理学视域中的孙犁》等专著问世,他的这篇悼文,情感真挚动人,写出了孙犁作品对读者的深远影响。杜康的诗歌创作于1992年,30多年过去,从诗歌练习册上抄录下来,仍然清新流畅、质朴情深。

2022年7月,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,我读到了由宋曙光策划、主编的纪念丛书“我与孙犁”。这套丛书共计五册,包括再准舟的《欣慰的回顾》、谢大光的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、肖复兴的《清风犁破三千纸》、卫建民的《耕堂闻见集》、宋曙光的《忆前辈孙犁》,五位著者均与孙犁有过深层交往,是走进孙犁文学世界的新的索引指南。循其路径,我随后又购买了《孙犁文集》《书记文录全集》《孙犁年谱》《孙犁传》等书籍,认真研读,并撰写了多篇文章。

在再准舟《欣慰的回顾》一书中,有专论孙犁《津门小集》的一篇文章:《〈津门小集〉:文学速写的典范》,又在《孙犁:一九六二》《协助孙犁编书的几篇文章》,读到《津门小集》的编辑出版对于孙犁研究的重要性。而在谢大光的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一书中,也有专文谈到《孙犁与〈津门小集〉》。孙犁出版于1962年的《津门小集》,全书共两万八千字,被再、谢两位老师如此看重,引起我的浓厚兴趣。在《孙犁文集·书信》卷末,有再准舟撰写的《孙犁作品单行、结集、版本沿革年表》,我从中查到《津门小集》诸篇目,又在《孙犁文集·散文》卷中找到相关文章,始料未及地开启了一段孙犁作品研讨之旅。

《津门小集》与白塘口

《津门小集》共收入孙犁18篇作品。1962年2月8日,孙犁在致再准舟的信中说:“这些短文,它的写作目的只是在于:在新的生活急剧变革之时,以作者全部的热情精力,做及时的‘一唱!’”在后记中又写道:“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,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,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做的颂歌,奉献给读者。”可以说,《津门小集》是孙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,天津人民新生活充满欢欣与热情的记录,是一曲“美的颂歌”。

18篇文章中,有进城之初满怀激情写下的《新生的天津》《人民的狂欢》,也有1950年,下工厂写的11篇速写。而《妇女的路》《刘桂兰》《青春的热力》《一天日记》《津沽路上有感》几篇,则是他1955年入冬后,到隶属津东郊区的白塘口乡深入生活、了解合作化运动的农村速写(据政协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文史委编的《辛庄溯源》记载,当时的白塘口乡下辖白塘口、上小汀、唐庄子三个村,乡政府坐落在白塘口村)。这几篇文章的写作时间,从1955年12月10日到1956年1月17日。《孙犁文集》中,在这5篇之后的《积肥与择菜》,文末标注写作时间“1956年1月”,内容是对白塘口村冬季积肥的青年团员的采访,与其他5篇属于同期同地写作,却不在《津门小集》篇目之内。疑惑之下,宋曙光老师帮我联系到当年编辑《津门小集》的再准舟先生,始知因当时没有找到这篇《积肥与择菜》,故未能收入书中。

关于白塘口的几篇速写,人物、事件具体生动,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十一、二位,基本是青年人,女性居多。孙犁在《妇女的路》中写道:“农村的劳动妇女,她们所经历的生活艰辛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她们负荷沉重,佝偻以行;她们长夜纺织,机杼、纺车的声音,和星晨共同起落。她们生育时营养不足,老年多咳嗽;她们终生,除去村歌小唱,不能接触更多的文化。”他深知: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,一开始就为农村劳动妇女,打开了通向解放和幸福的大门,铺设了斗争和前进的道路。但是这一条道路,并不是一时轻易地就可以建设成功……小农经济个体经营的弱点和农民生活的贫困,是建设这条道路的障碍。”

怀着对这些与母亲、妻子一样的农村女性深切的同情与爱,孙犁下乡到白塘口,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,他把视线更多地投向她们,笔墨更多地倾向她们。按作品中的人物年龄,有些可能还会在世,这引发了我的思考:生长在冀中,擅长写

不负平生识真金

悼 阎 琦

西北大学阎琦教授于5月初病故了。业内的学人都知道他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有着突出的成就,却很少有人晓得他还是一名“孙犁迷”。

阎琦在上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时,曾模仿孙犁的笔调,写了一篇短篇小说《柳歌儿》,歌颂农村的新女性,发表在1965年的《西安日报》副刊上。我知道,他入学前就迷恋文学创作,孙犁等写农村题材的几位名家,都是他崇拜的对象。入学后,他的作文受到了写作实习课老师的表扬。1981年硕士毕业留校后,他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几十年,但一届一届的研究生和本科生,都知道他十分喜爱孙犁的作品。

青年时代,他手边不离孙犁的那本《白洋淀记事》,不知翻了多少遍。

“文革”中有一天,西北大学学生三楼一层过厅东墙上,贴出两张小字报。一张是雷抒雁(比阎琦高一年级)写的,另一张是阎琦写的。具体内容记不清了,但记得两人的文笔都很好。留校后,阎琦把几十年的光阴,花在了研究李白、韩愈两位大家上。他的文集《识小集》里,除收录了一些研究唐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外,还有一组记人的散文。知人论世是他的特长,其文字的雅洁、空灵,更是引人入胜。这一组散文,都是写中文系几位已经辞世的学者的,其中多是前辈老师,也

农村的孙犁,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生活在天津,写天津乡村的只有《津门小集》里的几篇作品,难得而珍贵。如能实地走访孙犁曾经到过的村庄,或是见到他采访和写过的人,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吗?

我为有这个想法而激动不已。白塘口现归属津南区,我联系到该区的一位文友,询问能否找到孙犁当年到白塘口深入生活的知情人?一听是了解孙犁在家乡的行迹,文友热心相帮,但因时间久远,乡镇建制几经变化,白塘口村早已拆迁,未能找到知情人。不久,偶与津南区女作者李纪莲提起,方知她婆家就是白塘口的,我立即将孙犁文章中涉及的人名等信息传过去。经李纪莲细心电话寻访,终于找到《一天日记》中所写人物林桂兰的亲弟弟林桂起,并约好了相见时间。

寻迹白塘口

我们于2023年9月17日上午,来到津南区辛庄镇,与李纪莲一起去拜访林桂起老人。出发不久,我们便行驶到了津沽公路上,我仿佛看到那些冬日里,孙犁先生在城郊结合部的灰堆下车后,从这里去往白塘口的身影。在这条路上的所见所感触发了他从中国近代史开端到新中国成立、从城市到乡村的深切思考,并写下了《津沽路上有感》:“在这里的农村,邻近这样大的一个城市,无疑的,农民的生活是和都市紧紧联系着。都市曾经给过它哪些东西,或是它曾经以及将要给都市些什么?”他想到清末时帝国主义入侵后,国家民族陷入了深重灾难,想到日寇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,津郊人民经历的苦难和反抗斗争。他亲眼看到公路上连绵不断赶往城里的大车,有供应市民的嫩绿白菜,有运往造纸厂的金黄稻草;而奔赴乡村的,有运送化学肥料、新式农具的汽车,赶赴乡下为农民演出的演员和电影放映队等。他“深切地感到以先进的津沽公路本质的变化,彻底理解今天城市和乡村——互助相关的意义了。”

孙犁为时代热潮下的乡村变化而欢欣:“我走进了乡村,乡村正在进行紧张的、愉快的、千家万户的社会主义改造,强烈的、火热的社会主义激情,崇高的建设祖国的积极性,在乡村的胸怀里燃烧起来了。”他还特别写道:“我们还是应该多请那些年老的祖父、祖母、老姑母、老外婆,给我们讲些过去的故事……我们得以过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,国家得以在国际上这样坚强有力地站立起来,是走过了多么长远崎岖的路,经过了多少前仆后继、奋不顾身的斗争。”

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孙犁进城后思想的集中体现,与写于进城初期的《吴召儿》《山地回忆》《两天日记》等文章的写作思想一脉相承。一是不忘本的思想,即不忘艰难岁月里,人民竭尽所能给予的支撑、奉献,不忘与人民的血肉深情,共过苦的人民,也应共享胜利果实,更不应该被忘记;二是看到城里曾经的剥削阶级,不事生产却仍享受优渥生活,想到还过着艰苦生活的人民,感情上产生不悦;三是看到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战友,进城后因地位身份等变化而疏离,心理上产生不安。而这一切的根本,是孙犁写作思想与实践上的“人民立场”。

孙犁从小在农村感受民生之艰,“初学为文,意在人生,语言抒发,少年真情,同情苦弱,心忿不平”。他自高小、中学起,阅读进步书籍,由此产生对鲁迅先生一生不变的尊崇热爱,鲁迅的“人民立场”也成为孙犁写作思想的重要根基和遵循。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,他亲历了与人民建

有英年早逝的同事。特别是他写导师傅庚生先生的那篇,活灵活现,得其神似,气度格局实不一般。陕西师大的几位教授,一度在传看此文。在与他的交往中,我们经常谈及孙犁。

他父亲阎景翰(笔名侯雁北),任教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多年。其气质、文风,非常接近孙犁,淡泊名利,耕耘不息;为文质朴自然,清新隽永,著小说、散文近20部,人称“陕西文坛的一棵大树”。阎景翰早年为解放军文工团成员,晚年主编《写作艺术大词典》,聘请孙犁为顾问。他曾请书家写了孙犁的名言,挂于书房。他的几位及门弟子都是作家,受他的影响,这几位后辈无一不喜爱孙犁作品,议论孙犁的人品与文品,是他们见面时的一个话题。

阎景翰、阎琦父子俩著作等身,都酷爱孙犁及其作品。此种情况,在全国似不多见。这也表明,“荷花淀派”的影响是深远的,在西北地区,除贾平凹之外,还大有人在。阎琦先生就曾讲:我们醴泉阎家,与孙犁有缘!此非虚语。想到孙犁大师的作品对我所熟知的文人的沾溉、滋养,我情不自禁地说出心里话:感恩,礼拜,孙犁大师不朽!

阎琦去世一个多月了。他音容宛在,引人哀思。

端午节于西安

立的血肉深情,如《吴召儿》结尾处:“关于晋察冀,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。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,送来一碗烂酸菜;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,替我们背上走了行囊;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,给我们打开门,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,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。”他坚持的正是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的“无产阶级的和人民群众的立场”,写于进老城新旧交替节点的《新生的天津》《人民的狂欢》,写于1955年城乡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的《津沽路上有感》,都是孙犁自觉奉行并遵循的“人民立场”的体现,这是解读《津门小集》“美的颂歌”的钥匙,也是解读《铁木前传》等作品的钥匙。

很快,我们便在津沽公路边的白塘口小学门口,见到了李纪莲和她丈夫,还有津南区的几位文友。我们来到约见之地时,年已八旬的林桂起出来迎接,他豪爽热情,身后的院子里堆着很多建筑模板、脚手架等,原来他还担任着自己创业的建材租赁家族企业的老板。在场的还有现已82岁,从15岁时就从白塘口村迁居市里的他的表哥等人。林桂起老人带我们来到一片在建住宅楼前,介绍说这是白塘口村的还迁小区,属于白

《铁木前传》新考

——写在孙犁先生逝世22周年

南北洋



塘口地界。往北走不远,是1901年海河裁弯取直前的故道,原来这里有一座小桥,过了桥就是上小汀村。我立刻想到了孙犁在《青春的热力》中写的:“从白塘口村北,走过一架拱腰的小木桥,到上小汀只有半里多路。”孙犁到上小汀,是为采访村里22岁的女青年柴玉英,她为动员说服哥嫂和全家入社,不惜推迟婚期两年,以至男方解约。我想象,随着熟悉情况的带路人到处走动采访的孙犁先生,是怎样充满热情走进白塘口一户农家,感受着农业合作化的热潮,为林桂兰、柴玉英等年轻人,留下饱含青春热力的可爱形象,记录了她们果敢向前的行动,也为韩家筋、郑淑琴以及刘桂兰的公公、柴玉英的哥嫂等人,留下主动或被被动汇入合作化大潮的真实记录。

时近中午,我们到附近饭店用餐。看到我带去的《孙犁文集》中有关白塘口的记述,特别是关于姐姐林桂兰的内容,林桂起老人不禁感慨,作家写得准确了。他说,林桂兰后来一直担任村干部,68岁时因病去世。对书中写到的其他人,林桂起等人确认,有的已经去世,有的因为出嫁、居住分散,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健在。林桂起老人表示,他逐一落实后一定通知我。对《积肥与择菜》中写到的李文太,一位文友说,散步时还见到过呢。他表示找到李文太时会及时与我联系。

白塘口与《铁木前传》

白塘口,是天津市南区南面,距海河西岸不远的一个大村,据林桂起老人提供的《辛庄溯源》一书介绍:清末民初,辛庄地区最大、最古老的村庄白塘口,街景热闹繁华、店铺林立……出现过四周邻村及外地人来自白塘口赶大集的热闹场面,从此成就了白塘口的大村地位。1949年1月15日,天津解放,白塘口等十四个村成立了村级政权。1950年,白塘口村的李吉顺带头组织17户农民参加的互助组,是当时天津县第一个互助组(天津县,当时为河北省天津专区天津县,1952年4月21日,划归天津,1953年5月14日撤销天津县行政建制,设立津东、津南、津西、津北四个郊区,1956年1月1日起,分别更名为东郊区、南郊区、西郊区、北郊区,白塘口时属东郊区)。1951年,白塘口村在李吉顺倡导下,把互助组及合作组归并在一起,成立了由84户贫雇农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,这也是天津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。1955年,辛庄地区各村农业生产合

每个在中学河流中练习游泳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长满荷花的水泊
五十多年前,一个名叫孙犁的年轻人曾在沁人的荷香深处当过一年孩子王

但战争爆发了。这个名叫孙犁的年轻人,毅然抛下隔夜粮,扎上绑腿,加入一支放下锄头、扛起猎枪的队伍,奔赴黄沙遍地的圣地

那时,中国的圣地名唤延安
耸立的宝塔与含沙量很高的那条河流
至今,名气依然很大
让我们每个人都心驰神往

作社已经普及,共建立了34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集体农庄。1956年,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,辛庄地区全部建立了一乡一社式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,由白塘口村、上小汀村、唐庄子村组成的白塘口乡,建立了金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,白塘口村带头人李吉顺任社长。他出生于河北青县贫苦农家,解放前逃荒要饭来到白塘口,以扛活苦力为生,新中国成立后以极大热情积极工作,1951年,他被评为“河北省劳动模范”,是合作化高潮时期涌现的知名度很高的先进人物,1956年1月12日,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。白塘口在李吉顺带领下,始终走在农业合作化前列,在天津知名度很高,这也是孙犁到白塘口采访的原因吧。

在与林桂起等人见面之前,我收到津南区一位文友寄来的准备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校订本,其中讲述白塘口村木匠传人田树豹的一篇中,其父田景云在上世纪50年代,加入村里铁木二社的情节引起我的关注。按文中内容推断,田景云加入铁木二社的时间应该是在1955年,这与林桂起等人介绍的铁木二社建立时间基本相符。他们说,上世纪50年代,村里确实有铁木二社,建立时间或在1955年之前,但一时又说不上。据林桂起同村的李华成老人说,铁木二社曾迁址到他家不远处,他到铁木二社院里去收人家不要的刨花,拿回家烧火,院子里有铁工、木工和铁匠炉。约在1958年,铁木二社迁往海河东边的小东庄。

与林桂起等人见面后的第四天上午,津南区文友给我打来电话说,这些天,他们一直开车在路上转,终于遇到李文太老先生,让我前去会面。因我当时有事一时过不去,便在我电话里对李文太做了采访:李文太出生于1940年,他对孙犁采访青年团员积肥的事迹,还有清晰印象。李文太说,白塘口村的铁木二社是在1954年成立的,他那时放学后总去铁木二社的工厂玩,来自津南小站的一个铁匠,还与邻居张家的姑娘结了婚。

为进一步确认铁木二社成立时间,林桂起老人又找到白塘口年纪更大的一些老人了解情况并做了记录。我们再次来到白塘口,除上次见到的林桂起、李相清、李华成三位之外,还有82岁的李海津老人。据林桂起了解记录及李海津讲述,铁木二社成立于1954年,用的是村里官称杨四爷的地主家的旧宅。杨四爷家的房屋很多,铁木二社最初建在他家交给村里使用的房院,前院铁工、后院木工。1956年扩大后,迁到村东的新址,1958年再迁往小东庄。

据此,1955年入冬后,孙犁到白塘口深入生活时,白塘口村已有铁木二社,且发展良好。孙犁来到白塘口乡,先去坐落于白塘口村的乡政府听取情况介绍,再由熟悉情况的村人带着前去采访,铁木二社无疑是会进入孙犁耳中、眼里的存在,白塘口村洋溢着的进步的喜悦和热情,自然给了作家丰富的感受与创作的灵感。孙犁看到为之奋斗过的理想,正在这里蓬勃生长为美好现实,这里的人民正焕发出足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热忱和力量。进城后,他内心深处产生的不平、不安的感觉,突然找到了书写的载体;铁木之配合,如朋友互助,如战友无间,如城乡共荣;铁木之离殇,如朋友背弃,如战友疏离,如城乡发展之不平衡。还有比铁木之间的关系,更好表达这些难以言表的苦恼情绪的吗?

孙犁在给阎纲的《关于〈铁木前传〉的通信》中说:“这本书,从表面看,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。其实不然……我的写作习惯,写作之前,常常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……《铁木前传》的写作也是如此。它的起因,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。这种思想,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,过去是从没有的。这就是:进城以后,人和人的关系,因为地位,或因为别的,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。我很为这种变化苦恼。”《铁木前传》中,木匠黎老东生活好转后,做起发财致富梦,置了宅子,并背弃约定,使年老多病的女房主不得不离家,他提前入住;黎老东穿上温暖讲究的皮袄,袖手监工衣衫单薄破旧的患难朋友、铁匠傅老刚为自己打大车;穷苦时,为儿子六儿向铁匠提亲,如今孩子们都已长大,日子好了的他却不再提儿女婚事,羡慕黎七儿赶大车做买卖发财,寒冬里让傅老刚赶制大车,完工后却不给工钱……

铁匠和木匠关系变化的情节设计,正是孙犁进城后思想感情的体现:“因为这种思想,使我想到了朋友,因为朋友,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,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,这就是《铁木前传》的开始。”在白塘口听见的“铁木二社”,应该是让孙犁脑中灵光闪现的直接催化剂。“小说进一步明确主题,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,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。”孙犁明确说《铁木前传》不是1953年安国下乡的产物,而从安国下乡后的5篇速写看,一是从时间和内容上距合作化运动还比较远,二是《铁木前传》结尾的“但是,你的

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,你的舵手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,你正在满怀有信心地,负载着千斤的重量,奔赴万里的征途!你希望的不应该只是一帆风顺,你希望的是要具备了冲破惊涛骇浪,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的那一种力量。”这充满激情的、激励人心的一段,在安国下乡的诸篇速写中,找不到生发的感觉和氛围,而白塘口采访后的几篇速写里,那处处洋溢着的“青春的火力”,恰是产生《铁木前传》这种感情抒发的动因。

谢大光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一书中有篇《耕堂聊天记住》,1985年10月3日那天的记录载:“孙犁说《铁木前传》本来是要在(19)55年写的,后来一反胡风,写不下去了,拖到了(19)56年。”(1955年反胡风,批丁、陈,12月,孙犁到北京参加批丁、陈,但也许因对丁玲的敬重,与谢大光聊天时未提丁玲)。从时间上看,1955年入冬后的白塘口采访见闻,特别是铁木二社的存在,与后来的《铁木前传》写作,显然更符合水到渠成的创作规律。

孙犁在1956年1月,完成下乡采访任务,开始写作《铁木前传》,当1956年3月29日即将完稿时,却因过劳晕厥而突然摔倒,磕破面部,治疗后暂停写作,外出疗养。5月21日,孙犁回到天津,暂时封锁回津消息,闭门完成《铁木前传》的末章,正是小说结尾标注的“1956年初夏”。他在1956年5月31日给王林的信中说:“回来以后,对外封锁消息数日,盖因修改《铁木全传》颇为紧张……回来以后,突击五日,初稿完成,已交亢之同志审阅。其实没有多少字,只三万五千字,我前和你谈‘十万计划’,只能待后努力了。”1956年9月26日,又在给田间的信中说:“我这一年在半病中度过……只写了半部小说,其名《铁木前传》,十一月份,你大概可以看到。”据以上信件内容看,孙犁起初给小说起名《铁木全传》,并有“十万计划”的写作雄心。因身体原因,不得不匆匆结束,小说名也改成了《铁木前传》,并以此名在1956年第12期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,一部内涵深邃、解读不尽的优秀作品就此诞生。1957年1月,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《铁木前传》单行本。

富于美和诗意地写农村的“孙犁风格”,农业合作化的故事背景,精彩的叙述和结构、人物、情节设计,让喜爱《铁木前传》的读者如饮醇醪。但《铁木前传》与当时主导性的文艺创作思想对照显得“非主流”,致使围绕作品的争议,甚至批判不断——尽管批判者往往不得要领,如“负面人物比正面人物还多”的指摘,对作者创作倾向的诋毁等。实际上,含蓄是孙犁写作的重要特点,作者的倾向从不经意处细心阅读即可体察。如对被小满儿讽刺脸黑的九儿,作者这样描述:“九儿长高了……她的脸蛋儿很是干瘦,头发上挂满尘土,鞋面已经飞裂,只有一只大眼睛里射出的纯洁亲热的光芒,使人看出她对于回到这里来,是感到多么迫切和愉快。”“九儿上到滑车上,用力攀登着……四儿从井底望着她,一时感到这是一个奇异的动人的少女图像。”字里行间,能读出作者对傅老刚、四儿、九儿、锅灶等人的感情,他们不断学习进步,改变落后生产条件,积极走合作化道路,作者对他们肯定、赞赏;黎老东的生活陋习、情义日薄,黎大傻夫妻的好吃懒做,特别是丑陋凶悍的婆娘,白天走东串西,晚上家里人多得“挤倒屋子压塌炕”的混乱,六儿、杨卯儿的不务正业,黎七儿的生财有道和对吃香喝辣的生活追求,代表了“嫌贫爱富”和“吃喝玩乐”的不良诱惑。与傅老刚刚掰后的黎老东,见到回来的六儿,“在儿子的身上脸上,只能看见一层不成材的灰败气象”,作者的倾向在笔下表露无遗。

对很多人都认为是写女人美到极致的小满儿,作者写作时的感情应是复杂的。在上述“吃喝玩乐”的诱惑之外,小满儿是“色”的诱惑象征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、张子善贪腐大案,就发生在天津,特别是张子善在女色堆里的腐化,印证了孙犁进城后的感受和担忧,也是面临同样诱惑的人们需戒惕的。对于美的热爱和欣赏,是人的天性,希望小满儿这样美而动人的年轻女性,向着好的方向转变,也是作家的良好愿望。

小满儿的原型,有孙犁1953年在安国长仕村下乡时,房东儿媳满花的影子,但在借用满花俊俏的外貌之外,主要是借用她姐姐、姐夫的原型,塑造小满儿的姐姐、姐夫黎大傻夫妻。在安国速写的《齐满花》中,满花姐姐的丑陋,两口子好吃懒做、卖什么吃什么的情形,在《铁木前传》小满儿的姐姐、姐夫身上充分体现,小满儿身上的不安分,作为有夫之妇和六儿的鬼混纠缠,则有孙犁在《乡里旧闻》中,写童年时代“木匠的女儿”小杏的影子。

在《关于〈铁木前传〉的通信》中,孙犁说:“创作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。即使一个短篇,也很难说就是写的一时一地……它是通过创作,表现了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人与事的爱憎。”《铁木前传》是在孙犁进城后思想感情长期酝酿之下,在白塘口合作化热潮激荡下,由铁木二社引发灵感后创作出的不朽杰作。 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八三期

荷花淀

杜康



此起彼伏、连绵不绝的硝烟,熏黑了那个名叫孙犁的年轻人的清瘦脸颊
他俯身窑洞昏暗的油灯下
在清脆的塔铃和悠长的水声里
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,满怀对离别八年的母亲、妻子和故乡的思念

用浓淡不一的笔墨
为那个在月光下编织苇席的女人和名唤水生、举枪瞄准的年轻时生塑起了一座热爱和平的雕像

如今,名叫孙犁的那个年轻人老了
我们恭敬地称他为先生
先生在津寓所深居简出
如扎根白洋淀的老藕,以岁月为节撑起碧绿的荷叶,绽放迷人的荷香

而我陆续成年的弟弟妹妹
置身温暖的阳光下
用青蛙般干净的声音
诵读先生多年前
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
开创出一个文学流派的清新文章